

“东吴弄珠客”系董其昌考

徐恭时

一、序文署名

《金瓶梅》的作者究竟是谁？在《词话》本的欣欣子序文上说是“兰陵笑笑生”作。这个别署的真实姓名，尚未获见文献资料以明证。从明代万历后叶至清代，在某些笔记等书上，有人提出作者为某名士的一些推想，但未予考索。近几年来，文学研究者为解开《金瓶梅》作者之谜，广寻史料，注意探索，在专书、论文中先后提出若干人物的姓名。综观近四百年间，先后提到的作者人物，除论及集体创作者外，推断的名字约近三十人，诸说纷纭，难以归趋，其中提及的有些名字，论者已予否定，但究竟是谁所作？迄今还是一个难解的文化之谜。

在《词话》本的卷首载有“东吴弄珠客”所写的一篇序文，记年“万历丁巳季冬”，即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四十五年，公元 1617 年，季冬为十二月。

此序文易见，不引录。主要论及的有几点：一、此书袁宏道（石公）“亟称之”透示写序者与宏道有交往；二、指出此书的社会政治价值“作者盖为世戒，非为世劝也。”“亦楚《归机》之意”；三、于人物描写，评鹭为反面之净与丑；四、对于世人如何看待此书，举示或有四种心态，会产生不同后果；最后举友人偕一少年观剧所发的议论，引论对作品不宜看一时一事，应注意全局。

笔者想，这部小说的作者问题既一时难以归趋确定，如果能考明这位别署“东吴弄珠客”的人物究竟是谁，并联系写序地点在“金阊”（苏州古称之一），则作者要他写序，或许当时作者是在吴地一带活动的人物。倘顺此以求，再寻史料，或能探得作者。

有关论述《金瓶梅》的文章颇多，但未见对“东吴弄珠客”这一人物是谁的探索专文，今试作寻索，供研究者参稽。

二、四词疏析

为寻探这位“东吴弄珠客”是谁？需要对这个“署名”作分段疏析。

其一，序者在别署上用了古地名的别称——“东吴”。这倒可以给我们一个寻索地域范畴的界限，来探其里贯。在古籍上，不少作者的署贯每喜拈古名、别称、雅名，这是文士习惯，例证极多。

“吴”字溯源，是周初在江南所建的吴国，初都梅里，后徙吴城。传至吴王夫差，为越国所灭。由此江南一带就存在“吴”地之名。三国时，孙权建立吴国，鼎峙江南，也称“东吴”，三国吴韦昭纂《三吴郡国志》，其地域指苏南、浙西一带。唐陆广微著《吴地记》，包括：吴县、长洲、常熟、昆山、华亭、嘉兴、海盐等七县史料。清余怀自苏州至松江、太仓一带访友，归著《三吴游览志》一书。明归有光著《三吴水利录》，是书大旨述治吴中之水，宜专力于松江。历代于“三吴”的指地有异论，今不细列。

至于“东吴”之词，有泛称，有指地。明上海王圻著《东吴水利考》，清嘉定庄士仪著《东吴水利议》，系泛指七郡，但着重论苏松之水，此为泛称。至于指地者，例如清初顾炎武居昆山千墩（邻近青浦），其著作《亭林余集》上署籍贯为“东吴”。清王鸣盛世居嘉定，其刻印之著述，大都署贯“东吴”。清金山吴显曾著《东吴逸史》。清康熙五十四年上海县陈元模辑《淞南志》，亦署贯“东吴”，此书为今上

海县纪王、诸翟一带的小志。

南宁龚明之著《中吴纪闻》一书，自序称先世占籍“中吴”，龚氏昆山人。据此如作界限，并参考上引部分材料，今上海市境及吴淞江一带称为“东吴”，较为顺理。由于苏人也有署此古名者，今序者拈此“东吴”之名，避实就虚，似含迷惘，使读者一时不易明白序者究为何县人。如果联系别署真名，这地点易明。

其二、“弄珠”之典，系从郑交甫于汉皋见二神女遗珮事而衍化。明末清初人平湖钱士馨撰有《弄珠神女传》，为本邑名胜引发神话故事。

在浙江省平湖县的东门外有湖水一泓，名曰东湖，九水注此，里人比喻为九龙。明嘉靖三十七年（1558）浚治城河，以土填东湖中，成为圆洲，次年构“戏珠亭”于洲上，取“九龙弄珠于沧溟瀛海间”之意。至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）邑令王羲民经始增建楼阁，至三十四年（1606）夏由邑令汉阳萧鸣甲继筑落成，题名为“弄珠楼”，成为浙西一胜景，与嘉兴南湖之烟雨楼并称。清乾隆元年平湖张云锦汇纂有关此楼之诗文掌故，编成《东湖弄珠楼志》六卷，有传本。由此“弄珠楼”之胜景传播遐迩。经考东吴地域，他处无“弄珠”名典的胜迹，则序文所具“弄珠”一名，当归属于平湖地方。

其三，从“弄珠客”之“客”字释，此人当为异地而旅居平湖并应与弄珠之典有一段因缘的人物。

明万历十四年（1586），原上海人后占籍华亭之董其昌（1555—1636，字无宰，号香光、思翁，人称思白先生），在此年前曾两次赴举未中，尚为白衣秀才，他因事避地，旅居平湖，在冯大参家就馆。冯家为平邑大族，颇富。十五年，董氏离平，次年中举，十七年连捷成进士。

董其昌在平湖的一段生活材料，在他自著的《容台文集》中的《陶白斋稿》、《尘隐居士象赞》，自绘之《山居图》题跋，以及为平湖赵维寰所著《尚书蠹》序文中均有记述。当时董氏与平邑文结诗社唱酬，意气风发；在平也留下不少艺迹，如《意中家》数十帧画幅等。至于平邑人记他留平故事者，如：清初李廷《南吴旧话录》，清李尚《云间先进事略》，马承昭《当湖外志》，胡昌基《续撰李诗系》等书中均记及董氏活动之事。

当万历三十四年“弄珠楼”落成之际，此时董其昌在武昌任“湖广提学副使”，平湖县令萧鸣甲系汉阳人，因思董氏与当湖有地缘，在前之“戏珠亭”他曾履迹，为特向他求题匾额、对联。董氏爱飞白书“弄珠楼”三字，邑中孝廉冯钦仲原藏有董氏手书“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”一联，遵嘱移用。

董其昌复作《寄题萧使君〈弄珠楼〉诗》二律，今摘录于下：

- 一、 闲将乡思倚层霄，吴楚乾坤共。
 鹦鹉洲头催作赋，凤凰台上忆吹箫。
 山连秦望三神近，湖似浔阳九派消。
 一自明珠还海曲，采风应到弄珠谣。
- 二、 茂宰能将吏隐兼，楼开山岳散江潭。
 芷兰一一分湘浦，杨柳依依似汉南。
 地有骊龙供照乘，人如黄鹤解停骖。
 欲知交甫遗珠事，历乱星辰逗短檐。

董诗第一首末联“采风应到弄珠谣”有自注云：“弄珠，汉水遗事，使君为汉阳人，而平湖亦有汉塘，又称鹦鹉湖，于弄珠眷合。”诗后复跋云：“使君属余作榜书，更欲书联句，孝廉冯钦仲藏余二十五年书：晴川、芳草二语，即以悬之，若有冥数。是‘弄珠’之取义，又非仅在九水环拱矣。”——邑中即将董书之额、联刻以挂，题诗则镌石立于楼下壁间。特别是董氏诗中的“采风应到弄珠谣”句，含意深邃，邑人贺灿然拈此句赋诗十首。萧鸣甲等人之步董太史韵诸作，也先后刻石存于楼间。

明清之际,董诗之刻石失去,乾隆二十四年间邑令张力行于海昌访得,重置楼下,并作《还珠行》诗纪其事,和者亦众。如:沈初和诗中有句:“东湖一泓水,静若珠含骊,会心远寄汉皋佩,云间诗翰标瑰奇”。

明李日华著《味水轩日记》,万历三十七年二十九日条记:“早发至东湖,登弄珠楼,颇轩爽,前有一塔耸峙,左右有水九派,潮汐所通,俗谓之九龙吐珠,故以名楼。萧明府象林重创增伟丽焉。董太史思白题匾,甚庄雅可观。”

此后之天启、崇祯间,董氏还不断为平颍题邑书碑不一叙。

从董氏诗句、注跋中特拈“弄珠”二字谓同他有因缘,再从上引其他材料作综观,这位与“弄珠”产生地缘之“客”,可以归指董其昌。因为此浙西之“弄珠”胜景,虽非僻事,或人未注意耳。笔者再寻外县人物为弄珠楼题咏者虽不少,但大都属于偶或莅湖一游,或寄笈招和,未见有与此关连之“客”寄寓平湖者。

其四,在序文别署后有“漫书于金阊道中”的写作地点之记历。上面已疏析这位“东吴弄珠客”为董其昌之化名别署,宜续考董氏在万历四十五年丁巳(1617)的行踪,是否去“金阊”(苏州别称)。

考今人新编的《董其昌系年》及《董其昌年谱》二书,其内容主要记董氏的书画创作与题跋等材料,生平逸事引及较少。董氏书画跋每每记在某地写,于此可略窥其行踪,但如未发现有书画题跋见存者,均付阙如。

综考董氏书画所记写作地点,其书例大致有二:一为“道中”一词——例如:金阊道中、吴门道中、锡山道中、玉峰道中、龙华道中、嘉禾道中……等等。二为“舟次”一词——如:金阊舟次、吴阊舟次、金阊门舟中、青溪舟次、舟次西湖……等等。归纳见有五十余个地点题记。他还题有:“舟行洙泾道中”、“题于金阊门官舫”、“丹阳城下画舫中”等句。从他一生活动的已见材料看,很多时间是乘舟往来各地,在其画舫中绘画作书,或于古人艺术品作考题,则此“道中”两字,正与他书例相合。

当万历四十年间,已见书画题记上,董氏于三月十五日游苏州天平山,并往访沈周。五月间与陈继儒同去苏州访友。是岁炎夏,董氏居金阊歇夏。这年还乘舟游苏浙其他各地,至于冬间。因乏书画题记存世,今从序记这条材料上,可为行迹之补。

三、与《金》书关系

上节考出这位“东吴弄珠客”的别署者为董其昌,这还是从“弄珠”胜典同他曾结地缘,与后来为“弄珠楼”书额、咏诗等关系特征而寻索出的一个线索,这属于署名的一面,但还宜探明他与《金瓶梅》这部小说是否存在关系,才能作内外证结合的观察。

明万历间,湖广公安人袁宗道、袁宏道、袁中道兄弟三人,在文学上开创流派,人称“公安派”。董其昌与袁氏三兄弟均有交往。如:万历十六年(1588)董氏与袁宗道(字伯修)、唐文献等人共游于龙华寺,听憨山和尚禅语。次年,董、袁在京师,时有会晤。万历二十四年丙申(1596),袁宏道(1568—1610,字中郎,号石公。)时在吴县知县任上(23—25年任),此年十月间,中郎致书于董思白,引函于下:

一月前,石簔(笔者考此为陶望龄的别号)见过,剧谈五日,已乃放舟五湖,观七十二峰绝胜处,游竟复返衡署,摩霄极地,无所不谈,病魔为之少却,独恨坐无思白耳。

《金瓶梅》从何得来?伏枕略观,云霞满纸,胜于枚生《七发》多矣。后段在何处?抄竟,当于何处倒换?幸一的示。

宏道之弟中道(1570—1623,字小修),他在《游居柿录》卷九有日记一节记,节引于下:

往晤董太史思白,共说诸小说之佳者。思白曰:“近有一小说,名《金瓶梅》,极佳!”予私识之。后从中郎真州,见此书之半,大约模写儿女情态具备,乃从《水浒传》潘金莲演出一支。……

这节日记是后来补记。文中提到“后从中郎真州”，其时间是在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。董其昌与陈继儒于万历二十五年春三月共去苏州，中道随兄宏道在苏，云“往晤”的时间或在此际。

从上引材料中反映董其昌收藏一部《金瓶梅》的早期传抄本，借与宏道传录，并和中道评诸小说及此，称此书“极佳”。回看袁宏道（中郎、石公）《与董思白书》中语：“《金瓶梅》从何得来？伏枕略观，云霞满纸，胜于枚生《七发》多矣。”再与“弄珠客”序中云：“袁石公亟称之，亦自寄其牢骚耳，非有取于《金瓶梅》也。”两者语句互证，正相吻合。中郎集子在生前初刻未全，卒后始有《全集》刻本。故丁巳之序语中言，惟内情人才知——此亦可为董氏写序之参证。

董其昌收藏的《金瓶梅》传抄本，下限时间应在万历二十三年，因为下一年已将部分抄本借与袁宏道传录。他藏本系从何处传录，未见明记。引一些材料以考。

华亭相国徐阶（字子升，号少湖，生卒有异记，卒后谥文贞），其孙徐元春之女嫁与麻城刘承禧（约1560—1622，字延伯。过去有说是文震亨之婿，系误）。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五记：据袁中郎云，今惟麻城刘承禧家有全本，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。刘氏曾在京师任武职。又据新都吴延（字用卿，别号余清斋主人。他于万历二十四年刻《余清斋帖》）于天启二年跋《快雪时晴帖》中有云：“余与刘司隶延伯寓部门，知交有年，博古往来甚多。司隶罢官而归。……余后复偕刘司隶至云间，携余古玩近千金”。后来刘与妻家侄辈产生争产纠纷。董其昌于泰昌元年中秋作《风亭秋影图幅》，赠与徐阶之孙肇惠（字荇夫），上款称：“荇夫老亲家”，次年，又赠画与荇夫，题款同。于此可证董氏与徐阶之家是姻戚。因此推考董之藏本，或从徐家传录。

此外，续考若干有关人物的材料：

过去有提《金瓶梅》为王世贞所作说，之后有文否定，近顷又有重主此论者，或云其门人作。董其昌于万历十六年（1588）秋再赴南京乡试中式。以文采超群，备受王世贞称赏。较异者，董其昌于万历二十五年题宋江参《千里江山图》，写有长跋。跋中涉及严分宜从一巨公手中获得此卷，世蕃败，遂不复出。还提到《清明上河图》与此卷等俱归御府云云。这里存在一些蛛丝马迹。

有云陈继儒曾记叹赏《金瓶梅》事，陈与董同为云间人。交情至密，或相互题诗赠画，或互借藏书，或相偕出游，则见及《金瓶梅》有可能于董处借阅。陈继儒与袁宏道、屠隆相交亦密，曾共同评点诸书。尚有一事颇奇。据乾隆《诸城县志》记：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，山东诸城丁耀亢（字西生，号野鹤，别署紫阳道人等。1559—1670），于此际走江南，游于董其昌之门；后并与徐孚远等结文社。丁耀亢后作《续金瓶梅》六十四回。清顺治间刊本。据丁著《归山草》自记，康熙四年（1665）被指控写此小说而下狱，旋得释。丁氏写续书之因，也可思考。

从上述董其昌与《金瓶梅》有关人物的种种情事作综观，他化用“东吴弄珠客”之别署为《金瓶梅词话》写序，序文仅略示观感，并无不雅语。近闻山东新发现有董其昌致诸城丁家之书翰，云署名即为“弄珠客”，此函确切，则董氏写序问题更得辅证。